

李华生 著

回忆三十年代的 战斗生活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回忆三十年代 的战斗生活

李华生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回忆三十年代战斗生活

李华生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2插图 72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30

统一书号：11072·150

定 价：0.53元

(内部发行)

代 序

王 任 重

接到李华生同志的来信，让我为他写的几篇回忆录（集子）写个序言。这使我很高兴，又感到有些为难。高兴的是，首先使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延安的青年时代”。一九三七年七月，我被中共津南工委（赵鐔同志是工委书记）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八月份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庆祝党的生日十六周年的大会，第一次自由地高呼共产党万岁，高唱国际歌。对于一个地下党员来说，那种兴奋劲儿，简直难以形容。在这里，我才认识了李华生同志。我们一起在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工作过，并且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用炭火盆烤馍馍干，抹上炼过的猪油，这是当时最美好的食品了，也是对党校教职员的优待（每月比学生多供给二十斤面粉）。这时在延安有从全国许多地方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的上万名青年男女，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除中央党校之外，还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这两个学校都有人们爱唱的校歌。开群众大会时，互相

挑战，比赛唱歌。人们平常多半吃的是小米饭加南瓜汤，穿的是同样的灰色军装，差不多每个人的脸，都圆鼓鼓的闪耀着欢乐的红光。因此，我把这时的延安称为“延安的青年时代”。

一九三八年八月我离开延安回到抗日前线冀南工作（河北南部），一九四四年又回到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参加整风学习。在去延安的路上，经过绥德时，看望了李华生同志，当时他担任绥德地委的宣传部长。这时我是和妻子带了一个新生的小女儿一起到延安的。这个时期在党校学习的同学，差不多都有了妻子儿女，虽然年龄多数在三十岁上下，已不象一九三七年那些二十岁上下的人，那样生动活泼，到处一片歌声了。这时因为实行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生活大大改善了；文娱生活丰富了，有了周末舞会。我把这时的延安看作“中年时代”。这时经过整风学习和七大，人们的认识提高了，全党思想统一了，团结大大加强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我从延安回到了冀南。这时日本已经投降，整个冀南地区除永年县城暂时仍被国民党收买的一股土匪武装（铁磨头）占据之外，都是解放区。一个被日寇分割封锁的抗日根据地变成了人们可以自由来往的解放区，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难以了解这种大变化的。

使我高兴的另一件事，是抗日战争一头一尾这两

年，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学习，对于提高我的马列主义水平有着重大的作用。特别是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在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主要学习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观点和方法，着重检查了自己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缺点，这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益处。

因为我和李华生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对于他写的事情多半不大清楚，要我写序言对他的回忆录作出准确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能用自己的一点回忆作为代序了。我想读者是可以从阅读这本回忆录中，得到益处的。至少可以看到在“革命尚未成功”的岁月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共产党人是怎样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高贵品质。我们老年人回想起已经牺牲了的战友，应当怎样发挥自己的“余热”？中青年同志应当怎样接好老一辈的班？大家会自己找到答案的。这对于“追求特殊享受”和“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思想，将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

目 录

代 序.....王任重 (1)

在白色恐怖下办报的日日夜夜..... (1)

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事变的前前后后..... (27)

冀南游击战争的始末..... (54)

一九三五年平山人民的革命斗争..... (98)

在北方工作的十年..... (119)

在白色恐怖下办报的日日夜夜

一

一九三一年夏，团中央调我到上海沪东区任共青团区委宣传部长兼儿童局书记，任务是领导团的宣传工作。代表团区委领导一些工厂、学校、街道的团支部工作；并在沪东纱厂童工中创建儿童团组织的试验工作。从那时起，我也就担任了党的《红旗报》及全总《上海工人报》的记者，并参加刚建立不久的“新闻记者联盟”的组织活动，为报纸撰写稿子和组织沪东的通讯报道工作。“新联”是后来“中国文化总同盟”领导下八大联盟组织之一，这八大联盟即“左联”、“社联”、“剧联”、“影联”、“音联”、“美联”、“新联”、“教联”。这些组织当时都是党中央文委领导下的群众组织。

《红旗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三日刊，对开版，铅印，半公开发行，由党的地下印刷厂印刷。几次因地下印刷厂遭受破坏而停刊，出版不正常。它除了发表重要的政论文章外，还报道国内政治形势：各苏区作战，

反“围剿”的胜利消息和分配土地、实行劳动政策、保护贸易、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群众参军、拥军、扩大红军,支援前线作战等情况,还有全国各大中城市工人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上海各区反对资本家的论述和要闻。对上海消息报道特别突出,经常刊在第二版,约占每期四分之一的篇幅。《红旗报》编辑部要求记者写综合性的报道,包括一个工厂,一个产业,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的报道,如重大的罢工活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形式和方法,工人悲惨的生活及遭遇,突出的工人斗争的典型人物等。

《上海工人报》是全总的机关报,五日刊,四开版,铅印,半公开发行,由地下印刷厂印刷。也经常因印刷厂遭破坏而停刊,出版发行不正常。该报主要刊登赤色工会包括产业工会(如海总、铁总、纱总、烟总等)和地区工会的纲领,斗争号召,工会组织活动及召开代表大会的消息,各地工人罢工斗争及上海工人支援各地斗争的报道,揭露资产阶级向工人进攻的特点及剥削的办法,揭露黄色工会分裂工运及出卖工人的勾当,等等。它办得生动活泼,各版标题醒目,文章简练,文字通俗易懂。有的采用上海说白,中间刊以图像、漫画,在第四版下半栏每期刊有故事性的连环画。这是工会报纸的一大创造。长篇连环画刊登后出专辑。《上海工人报》征稿条件与《红旗报》不同,前者要求更加通

俗短小的文章，它不发表长篇大论的文章或系统性的连续性的专论。稿子的形式多种多样：叙述、批判、控诉、讨论、诗词、问答、歌曲、民谣、相声、对口、讲故事、三两分钟报告……等。工人文化水平高的让他们自己写，我们在文字上帮助修饰或润色。不能写的则由我们写或与工人合作写；或由团区委宣传部几个人一起讨论后写。总之，每篇稿子发出都是比较严肃认真的。

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为了做好共青团的工作，系统地开展宣传，撰写新闻稿子，首先是结合我们自身的思想改造进行的。团区委宣传部一共有五个同志，除我以外有秦祚昌，四川犍为人，上海中华艺大学生；陈明，广东人，暨南大学学生；湖南人小潘，上海美专学生；及浙江人小钱，上海中学生。我虽然比他们早几年参加革命工作，在上海沪西区、闸北区不少工厂和工人区工作过，但经验是不多的。而他们四个人刚从学校出来不久，都不熟悉工人，所以对如何接近工厂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与童工，了解他们的生活痛苦，熟悉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以便发动和组织领导他们斗争，就成为我们注视和研究的中心课题。那时党区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对于我们年轻同志都是循循善诱地教育，激励我们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思想感情上和他们打成一片。于是我和团宣传部的几位同志轮流

到新老怡和，申新五、七、九厂，公大等一些工厂去作临时工或零工、杂工，体验生活，学习工作。我们在工厂工人集中区摆小摊，在小学校开办夜校识字班，利用早晚工人上下班进出厂时间接近工人，经过团员或工会会员介绍和他们交谈。或另外自动找人，拉关系，找同乡、同姓交朋友。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改变我们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学生生活、学生气派、学生感情和学生腔调，实现工人化，大众化。我们在这一时期作了最大的努力，大家脱下了学生装，穿上了蓝衣短打工装，住到小胡同、弄堂工人区或工房，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到平凉路菜市场小饭馆，湖北人开的阳春面铺与工人一起吃饭，或吃工人包月饭，或自己烧饭，逐步地与工人熟悉起来，逐步地开展工作，进行新闻报道。

沪东区是一个大的工业区，所辖范围很大，包括引翔港、兰路、虹口一直到平凉路、杨树浦一带，有成百家日英美和华资大中小工厂，工人三十多万，其中产业工人二十多万。从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诞生后，建立劳动组合领导工人运动起，上海工人阶级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举世闻名，震动世界的反对日英帝国主义“五卅”惨案总同盟罢工，反对北洋军阀孙传芳，响应北伐的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工人都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成千上万的上海工人惨遭杀戮，但上海工

人运动的烈火不仅没有被扑灭,而且很快出现了新的回升。据统计,一九二八年共举行罢工一百四十多次。特别是一九二九年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全世界,一直延续到了一九三二年美国民主党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兰鹰”运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成千上万的工厂倒闭,商店歇业,银行关门,数以百万计的失业工人流浪街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遭到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波及,中外资本家为了克服经济恐慌,将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开展了对工人新的进攻,加重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工资,使长期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上海工人,更加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因而爆发了沪东、沪西区等大的罢工斗争。到了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由于党团工会的工作逐渐恢复、发展,上海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那时沪东区党团工会工作有相当基础。在日本公大、泰康(即日华)、同兴等五个厂,英国老怡和、新怡和、麻袋三个厂,中国申新五、七、九厂、恒丰纱厂,二十多家缫丝厂及织绸厂,英美烟草公司及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厂,美商祥泰木行以及造纸厂,锡箔厂,印刷厂,机印厂,英商瑞谔铁厂,祥生铁厂,黄浦码头,大坂码头,华顺码头等地方,都有党团组织或开展了工作。

当时党在上海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十大纲领,宣传第一次全苏大会,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创立苏区发展红军,宣传反对中外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职工运动的纲领。我们的新闻报道工作,都是结合着以上的宣传任务,组织领导工人开展大量的日常迫切的经济斗争。在此基础上,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动进行一些政治斗争,在青工童工中扩大建立青工小组和儿童团组织等一系列工作。

为着搞好工作,写好报道,对于工厂及工人的生活,工作时间,工资、待遇及要求,我们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了解。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我们熟悉了纱厂,烟厂,造船厂,码头等工人劳动生产的情况。譬如纱厂究竟有什么工序工段车间,经过一段工作之后,才知道棉花一进厂按拆包、清花、钢丝、条子、拣花、并条、粗纱、细纱、酌水、摇丝、织布、整理、打包等工序建立车间、工段。逐步懂得了工人不同的工种,技术操作要点,劳动强度及特殊的困难和要求。懂得工厂的组织结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管理,他们所依靠的一大批监工稽查包括包探、警察、流氓等,对工人任意毒打,敲榨勒索,非法侮辱人身及政治迫害等多种残暴手段和非人的剥削办法,从而进一步知道了上海工人在中外资本家工厂里工作,生活待遇是非常悲惨的,特别以日本

厂为甚。

对于以上的情况,我们不止一次进行了系统的报道。

工人每天工作时间实行的是日夜班十二小时工作制。即白班早六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夜班则是下午六点上班,第二天早六点下班,上海称:“六进六出”。有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六小时。工资很低,一般的十二元,最低的六元。如果将当时日本国内纱厂工人工资和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工资作一比较,正好前者是上海日厂工人工资的三倍。即是说日本资本家在其国内雇一个工人,在我国则可雇三个工人,剥削是很残酷的。工人住的房子,条件极端恶劣,七八家合住在一所二楼二底房子里,前后房、前后楼隔了又隔,隔以薄板或旧布帋,每户重床叠架,上下住人,所余空隙放置锅灶及马桶,人们栖息其中,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一二楼之间均有阁楼,常住着一两户,终年不见阳光,亦不能抬头直立,只得爬进爬出。由于许多人挤压在一起生活,空气无法流通,时常散发出一股令人难闻的恶臭。工人健康状况十分恶劣,营养不良,过分劳累,精神紧张,长期贫血,体质异常虚弱,不少人患结核病、心脏病、肾脏病、气喘病、高血压病、血糖低、脚肿、心悸、发晕昏迷、休克及其它多种流行病、并发症和大量的传染病,死亡时有发生。据有关方面统计,女工童工每年死亡率在百

分之六。

女工童工生活更为悲惨，工作时间和成年壮工一样十二小时，而工资则较他们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女工童工的劳动强度往往大大超过他们体力所能承担的程度。工作中稍有不慎，则被扣工资、罚工，强迫写悔过书、保单、打手印、没收工作簿、撕毁工作簿，强行没收工作簿上所记存的工资不予发给，……等等。因此，那时沪东区工人大大小小的反抗、怠工、罢工不断爆发，日必几起。我们的新闻报道除揭露资本家残酷的剥削之外，主要报道一些重大的或群情激愤的工人斗争事件。譬如工人在车间极度紧张地来回走着连续操作十二小时不让稍停，本来在一些车间备有小凳，可以坐息片刻，日本资本家首先取消了小凳，中外各厂仿行一律取消了小凳。同时又借口防止工人到厕所大小便怠工，日本资本家在一个二百多人的车间里发给拉屎尿牌两个，限制工人大小便，没牌拉屎尿罚洋五角，于是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几个厂举行了罢工，要求取消这种非法规定。又如发生了几次日本监工稽查借放工搜身时，对女工横加侮辱，在车间巡查时借机调戏女工，稍有不遂则借端寻事。对新入厂工人实行拍照验身，要女工也赤身裸体，蒙受日本医生之侮辱，引起了工人仇恨，痛殴日本监工稽查和日医，要求废除搜身验身制度，禁止侮辱女工。

那时上海中外纱厂中实行的包身工、养成工制度，对待童工更是惨无人道。由于国民党的残暴统治，连年天灾人祸，致使苏北一带农村迅速破产，农民无以谋生，逃荒要饭，卖儿鬻女比比皆是。日本人通过中国的管工（或包工头）到破产的江北农村中去招募男女童工，年龄七八岁至十五六岁，每名以二三十元代价或不给代价领来上海作苦工。这些童工在三年之内所得工资，每人每月约六元，全部归管工所得，而由中国管工供给他们以粗食淡饭，每月不及三元，管工则从中剥削三元多。因此，包身工、养成工身受日本资本家和管工（即包工头）双重剥削。他们上班进工厂，下班进工房，常年如是，无任何休假。政治上绝对服从管工的野蛮管教，受管工痛骂毒打是常事，无任何人身自由。他们经受非人待遇，吃不饱，穿不暖，常年过着饥寒交困的生活。如果不幸而生病，只有等死。

当时我们曾作过系统的分析报道，指出：日本资本家为什么采用这种比血汗工资还残忍的剥削呢？这是因为：（一）童工工资低，日本资本家可以从廉价劳动力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二）日本资本家利用中国管工作为他的工具，分给管工一部分剩余价值，以管工出面对待童工，也可转移民族矛盾。（三）童工们从江北乡间来到上海，人地生疏，年龄小，对无理的压迫打骂不敢反抗。（四）日本资本家与童工无雇佣关系，

在法律上不承担任何责任。(五)养成大批工人,从而扩大了劳动力市场供应量,一方面有利于资本家将雇佣工人工资降低至平均工资水平之下,采取更为苛刻的条件进行残酷的剥削;另一方面威胁在业工人不敢反抗及罢工。采取这种制度首先是上海十一家内外棉纱厂,后来为中外各厂所仿行。

关于童工中的包身工、养成工的许多问题,当时引起了《红旗报》与《上海工人报》的注意。邓中夏同志一九三一年冬从湘鄂西回到上海任救济总会主任的时候(他在湘鄂西任中央特派员),经常来沪东。“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派他和阮啸先同志(曾任福建省委书记)帮助沪东工作,中夏同志在沪东工作之余,和啸先同志找我们专门谈包身工、养成工的情况,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他那时正着手修改他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那本《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六年)和准备写该著的续篇,给我们的印象极其深刻。

二

随着工作逐步开展,我们的供稿及组织报道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开始供稿量少到供稿量多,以至常常出现稿子过剩,无法处理。于是宣传部同志经过讨论决定办《沪东青工报》,这样,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